

从“任氏”看中唐文人的性爱审美观

张 金 桐

(河北经贸大学 人文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61)

[作者简介] 张金桐(1963),男,河北故城人,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摘 要] 唐人性爱生活开放,但中唐文人并不仅仅为性欲而性爱,他们有他们的女性审美标准,《任氏传》中的任氏是其理想的性爱伙伴。任氏是唐传奇中最美、最忠于爱情的女子,她作为唐传奇女性人物画廊中的代表性人物,寄寓了作者及其中唐文人的女性审美理想。

[关键词] 中唐;文人;性爱审美观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4-0441-05

—

任氏,为中唐传奇《任氏传》中的人物,作者沈既济。任氏是唐传奇中写得最美且忠于爱情的女子。小说写任氏容貌,在数重比较与否定中肯定了任氏“天下未见”之美:

……崧迎问之:“有乎?”又问“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尝见之矣!”崧姻族广茂,且夙从逸游,多识美丽。乃问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伦也!”崧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伦。”是时吴王之女有第六者,则崧之内妹,秾艳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崧问曰:“孰与吴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伦也。”崧抚手大骇曰:“天下岂有斯人乎?”

而当韦崧亲睹任氏后,乃惊叹曰:“殆过于所传”矣!

任氏忠于爱情且富贵不能淫。任氏所爱之郑六是一个“贫无家,托身于妻族”的人,韦崧则是王侯出身的富家子,这一切出身于狐仙的任氏均了如指掌,可她偏偏坚贞地爱着郑六,只因为郑六虽知其为狐而不嫌弃。任氏对爱情的坚贞,最感人之处当表现在她对韦崧施暴反抗一节。当韦崧从家僮口中得知任氏美艳,找上门后,机敏的任氏用种种办法想打发他走,在均未奏效的情况下,便有了任氏反抗韦崧强暴的情节:

崧爱之发狂,乃拥而凌之,不服。崧以力制之,方急,则曰:“服矣。请少回旋。”既从,则捍御如初。如是者数四。崧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纵体不复抗拒,而神色惨变。崧问曰:“何色之不悦?”任氏长叹息曰:“郑六之可哀也!”崧曰:“何谓?”对曰:“郑生有六尺之躯,而不能庇一妇人,岂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耳,所称惬者,唯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馁,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为公所系耳。若糠粃可给,不当至是。”崧豪俊有义烈,闻其言,遽置之。

一个有识见、智慧、风骨与情性特异的女子玉立在读者面前。在任氏帮助下,郑六不但有了一个家,还有了丰厚的家资,以后又由武调得官。任氏明知跟随郑六赴任必遭不幸,但为了不使郑六失望,还是答应

了他的要求,终于途中为犬所害,以身殉情。

任氏虽为狐女,实际上代表了现实生活中那类美丽、聪颖、感情真挚、坚贞的女性形象。“妖狐”只是字面的意义,所写纯然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环绕人物的也是唐代社会上层冶游生活的风俗画,如果删去任氏出现和死去的那点怪异情节,几乎看不出她是一个狐女^[1](第57页)。任氏是唐人传奇中写得最让人惦记的女子,在唐传奇女性人物画廊中,任氏堪称代表,因此,她成了中唐文人理想的性爱伙伴。这其中当寄寓着作者沈既济自身的女性理想与审美观念。

沈既济(?—786?),《旧唐书》卷一四九、《新唐书》卷一三二有传,苏州吴人。沈既济博通群籍,史笔尤工,当时吏部侍郎杨炎颇赏识他。德宗即位,杨炎拜为相,荐沈既济有良史才,召拜为左拾遗、史馆修撰。建中二年(781)十月杨炎获罪贬崖州司马,沈既济受牵连而坐贬处州司户参军。后复入朝,官礼部员外郎,卒。沈既济著有《建中实录》十卷(《新唐书》起居注类),又著《选举志》十卷(《新唐书》职官类)、《江淮记乱》一卷(《宋志》传记类),《全唐文》卷四七六收其文六篇。沈既济所作传奇,传世者有两篇,一名《枕中记》,一名《任氏传》。李肇《国史补》卷下说:“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唐语林》卷二《文学》说:“沈既济撰《枕中记》,韩愈撰《毛颖传》,不下史篇,良史才也。”《任氏传》,《虞初志》评说“酷肖是时情状”,“似谑似庄,愈嚼愈觉有味”,“妆点处根株果叶宛若见之”,“奔骇光景极善形摹”,“情与词转觉纤媚”,“叙问转折仿佛欲真”^[2](第268页)。《情史》卷二一《情妖类》说:“……任氏,可谓人面人心矣!美逾西子,节比共姜,古今人类中何可多得!苍犬无知,作此大杀风景事。思之欲恸,岂特韦、郑二君已哉!”沈既济算得一位“渊博之士”,他的历史学养、为官阅历和个人心路,使他具备了高于世俗的女性欣赏眼光,故其笔下之任氏于惊世美貌、坚贞爱情、卓贤智慧兼而有之,而沈氏尤看重任氏之“情性”,特于传奇结尾处感喟其“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实乃寄寓了中唐文人的女性审美观念。

二

唐前期文人的性爱生活粗俗混乱。《旧唐书·本传》载,许敬宗以侍婢为继室,其子昂又素与继室私通,“烝之不绝”。《朝野僉载》卷一载,太常少卿卢崇道常与裴珪妻赵氏通奸;又载张亮、裴谈、裴光庭之妻都有情夫。在宫廷,性爱生活更为混乱,张易之、张昌宗都是武则天的男宠,武三思与中宗韦后、上官昭容共同私通,马秦客、杨均也都是韦后的男宠,一些为官文人还多有与公主相乱者,如太子詹事李昇、蜀州别驾萧鼎、彭州司马李万皆与郾国公主相乱,武延秀素与安乐公主私通。其实,只要读一读张鷟的传奇《游仙窟》,便可以了解唐前期文人的性爱生活了。张鷟为典型文人,时称“鷟文辞犹青铜钱,万选万中”,号“青钱学士”。《游仙窟》为张鷟自叙从汧陇奉使河源,因途中乏困,夜止宿一大宅,遂与女主人宴饮歌舞,调笑戏谑,至无所不为。文中写到:“昔日双眠,恒嫌夜短,今宵独卧,实愁更长”,故恳求“空悬欲断之肠,请教临终之命。元来不见,他自寻常;无故相逢,却交烦恼。敢陈心素,幸愿昭知”。请看一段双方欢会、饮酒赛赌的对话:

十娘笑曰:“莫相弄!且取双六局来,共少府公赌酒。”仆答曰:“下官不能赌酒,共娘子赌宿。”十娘问曰:“若为赌宿?”余答曰:“十娘输筹,则共下官卧一宿;下官输筹,则共十娘卧一宿。”十娘笑曰:“汉骑驴则胡步行,胡步行则汉骑驴;总悉输他便点。儿递换作,少府公太能生。”五嫂曰:“新妇报娘子:不须赌来赌去,今夜定知娘子不免。”

这段对话虽写张鷟经历,而在唐前期文人性爱生活中实有一定代表性,皆是因为唐朝以武立国,前期疏于教化,文人女性审美观念淡化,且胡风盛行的结果。

中唐以后,世风转向,文人观念也有了明显变化,其性爱生活一改前期鄙俗、龌龊形态,变为虽风流而具审美性。

唐代中后期,国力衰落,政治统治松弛,唐王朝已不具有前期的气魄和心胸,于是,加强思想统治成

了这一时期的突出任务。这个时期,作为国学的儒学从三教中屈从地位被推向前台。韩愈、柳宗元等人从重振儒学目的出发,强调儒家的“仁”、“义”。于是,社会重新以儒家伦理来规范人们的行为。随着儒家伦理原则被重新提出,作为束缚妇女行为的一些封建礼教便得以加强。这个时期出现了影响较大的女教之书宋氏姐妹的《女论语》等。宋氏姐妹,即宋若莘、宋若昭。姐妹“年未及笄,皆能属文”,后被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表荐以闻,德宗俱召入宫,宫中均以“学士”、“先生”称之。其《女论语》追踵班昭《女诫》而作,成为后世女子必读教科书之一。此书分为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和柔、守节等十二章,涉及女子自幼至老家庭生活、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女论语》几乎对女子的一行一动、一颦一笑都作了具体规定,它把妇女教育从理论上进行了规范化、条理化、具体化。

实际上,就这一时期对公主严加礼法约束的政策来看,也可以反映出世俗眼光对妇女的要求。德宗朝至宣宗时期,对公主们特别提出了遵礼守法政策。德宗建中元年(780)九月曾下诏废除无据可寻的婚嫁函书,继而重新整理早已混乱的亲王、公主属籍,并依礼以时嫁娶^[3](卷150 德宗顺宗诸子传)。同时重新严格规定公主出嫁时所乘车的规模,以及公主婚礼的仪式过程。当时,又以公主出嫁时于公婆无尊礼,乃命礼官“约古今旧仪,及开元礼,详定公主郡主县主出降觐见之仪”^[4](卷38 嫁娶)。宪宗以后的皇帝不仅在制度上对公主的行为进行了多方规范,在行动上对她们更是严格要求。《资治通鉴》卷248载:宣宗大中二年十一月,“万寿公主适起居郎郑颢。……颢弟颢,尝得危疾,上遣使视之,还,问:‘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观戏场。’上怒,叹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与我家为婚,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宫,立之阶下,不之视。公主惧,涕泣谢罪。上责之曰:‘岂有小郎病,不往省视,乃观戏乎!’遣归郑氏。由是终上之世,贵戚皆兢兢守礼法,如山东衣冠之族。”同书卷249载:大中十三年夏四月,宣宗女儿永福公主骄悍无礼,宣宗本欲将其嫁与有大志的书生于琮,“既而中寝,宰相请其故,上曰:‘朕近与此女子同食,对朕辄折匕箸。性情如是,岂可为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广德公主”。由对公主要求之严,足以反映出这个时期对妇女要求的严格。

事实上,从整个唐代公主离婚再嫁状况看,也可以说明唐代后期较之前期对妇女伦常的重视。《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载,从高宗至昭宗,传中有名的公主212名,其中初婚者104名,二嫁者25名,三嫁者4名。其他便为早薨、未嫁、出家为道,或婚姻状况缺载者。而二嫁、三嫁之公主均集中在唐前期,其中玄宗朝最多,竟有9人,从代宗至唐亡则不见公主再醮事。公主淫乱之事也发生在唐前期,如太宗女高阳公主、中宗女安乐公主、肃宗女郾国公主等。宣宗时“诏夫妇,教化之端。其公主、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复嫁”^[5](卷83 诸帝公主传)。

文人是社会意识的代表,也是社会观念意识的领先接受者。他们受传统文化影响最深,又是传统文化的承传者。上千年的妇教文化在文人的心底有着很深的根基,而这个时期对妇教的强化,也必定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影响,促使他们改变女性观念。中唐文人有感于前期妇女性爱放纵以致淫乱,认为应该强化妇女教育,规范其行为,以保持社会风气的纯正,这从他们的诗文作品中可以得到反应。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是指责小家女与人私奔的,其题序说“止淫奔也”。他的《古冢狐》又是指责女子以色迷人的,题序说“戒艳色也”。元稹在《莺莺传》中,也把崔莺莺看成“妖于人”的“尤物”,而把一切责任都推在她身上。特别是柳宗元的《河间传》对妇女性爱的指责,其笔墨更加淋漓。传叙河间妇本具贤德操守,其族中有丑行者预谋诱其失行,便以美辞邀之邀嬉,妇始羞于为类,固辞;其姑却以不宜拒人好意而强之,于是,妇与丑行者游。用餐间,妇闻男子声,惊归,闭户不出。期年复游,终为恶少所奸,妇意甚适。从此,河间妇辟门宣淫,晨夜不止,遍交长安无赖,其名不堪忍闻。宋人李季可《松窗百说·柳宗元》云:“柳宗元作《河间传》,足以讽一而劝百。”基于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思想观念,于是在文人的性爱生活中,对性爱伙伴的选择就有了一定的标准。

终唐之世盛行文人狎妓风气,但这个时期的文人并不是凡妓便狎,而是有了选择性。平康坊是当时长安青楼集中地,孙棨《北里志·海论三曲中事》记载:“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数厅事,前后植花卉,或有怪石盆

池,左右对设,小堂垂帘,茵塌帟幌之类称是。”《北里志·序》又说:“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语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辍叔孙之朝,致杨乘之感。比常闻蜀妓薛涛之才辩,必谓人过言,及睹北里二三子之徒,则薛涛远有惭德矣。”文人的去处便是这样的典雅精致之地,其选择的性爱伙伴又是这类才艺出众的女子。门阀观念下文人有婚无爱的失败婚姻,似乎在這些女子身上得到了补偿。文人与这类女子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为性欲而性爱,其中也寄寓了更高层次的精神慰藉。据记载,王建、元稹、白居易等都与名妓薛涛来往密切,陆羽、皎然、刘长卿又都是妓女李季兰的好友,许多文人也曾与鱼玄机有往来,此三女子才艺俱佳,《唐才子传》均为其作传。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说过,文人们与妓女的交往其实在于他们渴望与女人建立一种无拘无束、朋友般的关系,而不一定非得发生性关系。一个男人可以与艺妓日益亲昵,但并不一定非导致性爱不可^[6](第239页)。这一时期文人对性爱伙伴的选择标准,昭示了他们独特的女性审美观念。这在本时期的传奇作品中得到了比较明显的反映。

三

中唐时期的传奇小说,有一个美丽而忠于爱情的女性人物画廊,反应了中唐文人的女性审美观。我们来看这些女性人物:《李娃传》写李娃“妖姿要妙,绝代未有”,“明眸皓腕,举步艳冶”,郑生初与之相遇,便“情甚相慕”,继之“扣其门”,“娃大悦”,且“整装易服而出”;当郑生“囊中尽空,乃鬻骏乘及其家僮”,“姥意渐怠”时,而“娃情弥笃”。李娃从大雪中将郑生救回,姥“当逐之”,娃又敛容却睇曰:“不然”,终与郑生结为夫妇。作者白行简说李娃“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霍小玉传》写霍小玉,“姿质秾艳”,“高情逸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若琼林玉树,互相照耀,转盼精彩照人”,自见李益,二人便“婉娈相得,若翡翠之在云路也。如此二岁,日夜相从”。当李益另攀高门杳无音讯时,小玉竟变卖手饰,“遍请亲朋,多方召致”,且“日夜涕泣,都忘寝食,期一相见,竟无因由。冤愤益深,委顿床枕”,竟致“饮恨而终”。《柳氏传》写柳氏“容色非常”,“艳绝一时”,既“慕翊之才”,便许终身;因韩翃擢第省亲,二人暂时分开;又因安史乱起,韩、柳不得相见;其间,柳氏经历了惊逃、削发改容、避难法灵寺、遭蕃将劫掠、被许俊夺回、讨得皇帝旨意等磨难,终得与韩翃团圆。柳氏被许尧佐说成是“有志之妾”。《李章武传》写王氏子妇阅人既多而未尝动心,初见章武便以身相许,又因不见章武而命陨黄泉;《柳毅传》中的小龙女钟情于儒生柳毅,非柳毅不嫁。《长恨歌传》中的杨贵妃,“鬓发腻理,纤秾中度,举止闲冶,如汉武帝李夫人”,“既出水,体弱力微,若不任罗绮。光彩焕发,转动照人”,她虽不是以文人性爱伙伴的身分出现的,但作为文人笔下人物,其美艳也渗入了文人的女性审美意识。

唐人小说大多是文人写文人事的,小说中的男性人物也多为文人身分,因此,他们对女性即对方的感觉与行为,实际反映的也是小说家文人的女性审美眼光。郑生一见李娃,“不觉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诈坠鞭于地,候其从者,敕取之。累眄于娃”,继而,郑生“意若有失,乃密征其友游长安之熟者,以讯之”,又见李娃,“生遽惊起,莫感仰视。与之拜毕,叙寒燠,触类研媚,目所未睹”。李益对霍小玉说:“平生志愿,今日获从,粉骨碎身,誓不相舍。”而李章武初见王氏子妇,便觉“甚美,因给信云:‘须州外与亲故知闻。’遂赁舍于美人之家。”“既而两心克谐,情好弥切”。郑六初遇任氏“见之惊悦,策其驴,忽先之,忽后之,将挑而未敢”,且随之而去。这些男人与对方均一见钟情,有的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认为这才是他们的理想中人。这些人物虽为小说中人,但有的则涉真人仕历,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韩翃为大历十才子之一,《新唐书》卷二〇三、《唐诗纪事》卷三〇、《唐才子传》卷四均有其传。李章武,字子飞,中山人。敏博工文,洞达玄微,时人比之张华,曾事东平丞相府,《全唐诗》卷五一六有传。李益,字君虞,陇西姑臧人。《旧唐书》卷一三七、《新唐书》卷二〇三、《唐诗纪事》卷三〇、《唐才子传》卷四载其大历四年(769年)进士,六年(771年)登讽谏主文科,建中四年(783年)又登拔萃科,释褐郑县尉。北游燕赵,幽州节度使刘济辟为从事,未几又佐邠宁府。宪宗闻其名,召为秘书少监、集贤殿学士,累迁右散骑常侍。

大和初(827年)以礼部尚书致仕。至于韦崱,仍实有其人,《元和姓纂》卷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四上》均说韦崱为龙州刺史,与《任氏传》述其为殿中侍御史兼龙州刺史相合。这些既为小说中人,而生活中又实有的人物,他们的言行不仅更加真实地揭示了中唐文人的女性审美眼光,而且为这一女性人物画廊增加了许多色彩。在这一女性人物画廊中,无疑任氏是最美、最富人情味的人物,因此,她便成了中唐文人理想的性爱伙伴。这一人物形象,不仅寄寓了作者沈既济生活的和审美的理想,而且代表性地反映了中唐文人的女性审美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中唐以后世风向内敛、保守的转变!

[参 考 文 献]

- [1] 何满子,李时人. 古代短篇小说名作评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2] 李剑国. 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 [3]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 [4]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 [5] 唐会要[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 [6] [荷兰]高罗佩. 中国古代房内考[M]. 李 零,郭晓惠,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 何坤翁)

Look at Literati's Aesthetic View in Middle Tang Dynasty on Sexual Love from“ Female of Ren”

ZHANG Jintong

(Humanity College,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 Hebei, China)

Biography: ZHANG Jintong (1963), male, Doctor, Professor, Humanity College,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majoring in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female of Ren in the Legend of Female of Ren is the ideal sexual partner, who is the most beautiful and the most devoted to love. The female of Ren,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legendary female portraits in Tang Dynasty embodies the author and the literati's aesthetic ideal of females. With the changing of the public morals of the middle Tang and the transforming of the literati's ideas, they require their sexual partners should be of beauty and of the devotion to love, which reflects the literati's aesthetic outlook on females in this period.

Key words: middle period of Tang; literati; aesthetic view on sexual love